

## 汉字适合汉语书面语

胡明亮

### 一、汉语的节段化

节段化对于识别一串的结构很重要，比如，把一亿写成100,000,000就比100000000容易识别。①

现行的书面汉语并不在“词”中间留空。写在一起的一组汉字，如果不了解每个字的意思，就很容易误解整个字组的意思。例如有一本英文书把某座房子的名称“南树德堂”的结构理解成“[南树][德堂]”，结果翻译成英文“Virtuous Hall of Southern Tree”②这里的“树”，实际上是“建树”的意思。整个字组的结构应该是“南[[树德]堂]”，似乎可以翻译成“Southern Hall of Establishing Virtues”。

从英语可以看出，节段化确实有利于语义的理解。但是，如果说理解汉语全靠单个字义的理解，那也不对。汉语的理解，例如对写在一起的“南树德堂”的理解，除了字义的理解以外，也要求对语法结构的理解，如认识到“树”和“德”是述宾关系，“树德”和“堂”是偏正关系，“南”和“树德堂”是偏正关系，等等。同样，理解英语分开写的“Southern Hall of Establishing Virtues”，除了明白单词的词义以外，也应该理解这个短语的语法结构。

话又说回来，汉语也不是没有一点儿节段化。比如，汉语的逗号就比英语用得更多，也用得比较灵活，实际上也起着节段化的作用。如下所示：

(1) 她为了到美国留学，念了一年英文。

(2) 今天，星期天。

例(1)句中的逗号一般不省，而例(2)的逗号可以省去。试比较英语句子：

(3) She studied English for a year in order to go to study in America.

(4) Today is Sunday.

例(3)的“year”后一般不加逗号。例(4)除了极为特殊的原因，“today”后也不加逗号。总之，除了字义以外，语法结构和一定程度的节段化对理解汉语书面语也具有很重要的作用。

### 二、“词”和语法分析

一般认为，“词”的定义，对于汉语拼音文字的节段化非常重要。但是汉语里的“词”究竟应该怎样界定，却是汉语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直到今天还没有吵清楚。

其实，即使是英语的“词”(word)的概念，也没有确定。一般只是把两个空之间的一串字母看作一个词。比如“*She lives in this city*”(她在这个城市住)这句话有五个词。但是这个方法有时行不通。比如，分开写的*Hong Kong*(香港)应该算两个词吗？又比如，*the United States*(美国)，应该算几个词？困难不仅限于专用名词。把*workman*(工人)和*workday*(工作日)算单个的词，而把*work force*(劳动力)和*work load*(工作量)算作词组，就很勉强。③

同英语相比，汉语里“词”的概念更为模糊。这不能怪汉语没有“法治”，只能怪长期以来，很多中外学者设法将“词”这个概念系统地用于汉语研究。虽然我们在分析语法时，会用到“名词”、“动词”和“介词”等，但并不是说非得确定每一个字组是词还是词组。对汉语分析来说，更重要的是弄清楚句子内各成分之间的关系。比如分析“她在香港上学”这句话，不是要花很多时间弄清楚“上学”究竟是词还是词组，而是要弄清楚句

子的组合关系是“她[[在]香港]] [上学]”，不是“[[她在]香[[港上]学]”，认识到“上”跟“学”之间的关系比“上”跟“港”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

### 三、汉字和汉语书面语

虽然文字比口语出现晚，但我们不应把文字简单地看作语音的附属品，把书面语看作口语的简单复制。我很同意Chad Hansen的观点：拼音文字的解读可能通过文字→语音→语义的途径，但汉字的解读则是通过文字→语义的途径。④当然，文字可以同语音（音素或音节）对应起来，便于会说得人较快地学会读和写。这就是世界绝大多数文字所走的拼音化道路。但是汉字没有走这条路。正如苏瑞所说，汉字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义化”的道路。⑤

汉字没有走拼音化的道路，不能否认存在着人为干扰等外在因素，但更重要的是语言结构的内在因素。

首先，书面语（包括英语）需要更多的视觉信号，以减少因为缺乏停顿、重音、音调和音长等听觉信号而引起的误解。文字的节段化如连写、空格和连字符号，标点符号如英文“he's”中的省略号，大小写如德文名词的大写开头，语法形式如连接词语，所有这些手段都是为了增加视觉信号，保证信息的传递。

其次，汉语书面语比其他书面语需要更多的视觉信号。这一方面是因为汉语同音语素多，另一方面是因为汉语的语法标记少。汉语表示单复数以及时态等的词性变化还很少，不能算是一种屈折语言。名词组的格标记也没充分发展起来，如“把”字的使用跟动词的“补语”有关，“被”仍有“不利”义，“在”还有动词的特征，等等，所以也不能算是一种粘着语言。

汉字的结构比拼音文字复杂，数量大，信息量大，弥补了汉语同音语素多而语法标记少的不足。近几十年来新出现的“他、她、它”以及“的、得、地”等不同形式，也是为了增加书面语的视觉信号，所发生的“义化”过程。

所以说，汉字的现状，是汉字几千年来为适应汉语书面语而发展变化（即“义化”）的结果。

### 四、其他文字的拼音化

历史上曾经长期使用汉字的越南、日本、朝鲜等语言，都先后采用了拼音文字。国内的壮语也于1957年改为拼音文字。有人据此认为，汉语采用拼音文字，也应该是理所当然的。笔者认为，这四种语言实行拼音化的自身条件都比汉语好。

先看越南语。越南语单音节占大多数，词形变化也很少，但改为拼音文字以后并没有多少歧义问题。这是因为越南语的音节比较复杂。越南语的音节可以表示为：(辅音)(半元音)元音(元音)(辅音)。前半部的(辅音)(半元音)可多达33种组合，后半部的元音(元音)(辅音)可多达120种组合。这样，可供选用的音节有三千多个。如果再加上六个声调，音节形式超过一万。⑥同汉语相比，越南语的同音词很少。所以，拼音文字适合越南语，并不能说明拼音文字也适合汉语。

再看日语。日语的音节比汉语简单得多，其数目也比汉语少得多，只两百左右。日语除实词以外以音节文字（假名）为主，也没有给阅读带来多少困难。这首先是因为日语实词中的汉字仍起很大辨义作用。其次，日语作为一种粘着语言，各种各样的格助词以及动词形容词等的词尾，对于划分句子成分，减少歧义，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最后，日语除了助词等虚词以外，实际话语篇章的绝大多数词都是多音节，因此同音语素或同音词很少。可以预见，如果日语将来全部采用假名或者拉丁字母，遇到的困难也会比汉语少的多。

朝鲜语的音节也比汉语多得多，据周有光说在2200到2400之间。⑦因此同音语素也较少。另外，朝鲜语也属粘着语，名词的格位由格助词表示。动词的变化很丰富，一个动词后面可依次附上五六个语素，表示不同的时态、语态等。⑧再适当加以节段化，歧义也很少，朝鲜语实行拼音化也是比较容易的。

最后看壮语。壮语像汉语一样，名词没有性数格等不同形式，动词也没有时态变化，词序的区别作用很重要。壮语词汇中单音节词占绝大多数，比汉语多得多。但是壮语改为拼音文字以后，也没有因同音词语而产生很多歧义。这还是因为壮语的音节种类多。根据郑林曦的估计，壮语中可选用的音节达一万九千多个。⑨就是根据Ramsey所给的资料进行保守的估算，可选用的音节也有九千多个。⑩所以，壮语采用拼音文字，比汉语容易得多。

## 五、结语

值得一提的，是近来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瞩目的“女书”文字。这是曾经流传于湖南江永县一带妇女中间的文字。它记录的是当地的汉语方言。根据周有光《传男不传女的“女书”》一文的介绍（《人民日报》（海外版）1991年7月12日第二版），这个方言有四百多种音节，还有五个声调。据此推算，带不同声调的音节可多达两千。女书使用的音节文字（很像汉字）只有六百多个。这样一来，平均一个字要表示三、四个音节，产生歧义的可能性一定很大，这种文字是怎样消除歧义的？它是怎样从表义演变为表音的？这都有待于我们深入研究。

但就我们所知道的几种拼音文字来看，语言结构本身对拼音化的成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汉语书面语的特点决定了汉字还会存在下去。除了“藏”、“嚷”等繁难字型需要进一步简化以外，整个汉字系统不会有重大的改变。至于利用拼音文字进行计算机输入、汉语教学、编制索引等，那也只是文字使用的很小的范围，同汉语书面语的大规模拼音化，不能同日而语。

最后想强调的是：汉字跟英法德等拼音文字相比，决不是牛车跟汽车相比，也不是慢汽车跟快汽车相比。更恰当的比方是轮船跟汽车相比。在陆地上，用汽车合适；在江河里，用轮船合适。

## 注释：

①孔宪中说许多人认为100000000比100,000,000“简单”，见《语文建设通讯》第39期46页。但不能否认，100000000的确比100,000,000难认。

②见John Byron、Robert Pack合著《The Claws of the Dragon》第37页

③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的Carole Chaski在1990年美国东南语言学学会年会宣读的论文《The Concept of "Word" for Linguists, Oral Poets and Non-Readers》，讨论了“word”这一概念所面临的许多问题。

④见Chad Hansen《Chinese Ideographs and Western Ideas》，载《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第52(2)期373-399页。

⑤见苏瑞《论汉字的义化》，载《语文建设通讯》第38期25-28页。

⑥有关越南语音节的估算，依据Laurence C. Thompson著《A Vietnamese Reference Grammar》42-57页。

⑦见周有光《应用语言学 and 语言计划》，载《语文建设通讯》，第38期1-6页。

⑧见Bernard Comrie《The World's Major Languages》891页。

⑨见郑林曦《没有汉语汉字的“科学性”，只有科学地研究汉字》，载《语文建设通讯》第35期41-47页。

⑩见S. Robert Ramsey《The Languages of China》236-238页。

（原载《语文建设通讯》（1994年）第44期20-23页；个别字句有改动）

[Back to my papers](#)

[Back to my main page](#)